

# 追求质量

## 单靠高增长无法改善社会状况

蒙特福特·穆拉驰拉、雷纳·塔普索巴、桑帕闻德·塔普索巴

将强劲的经济增长转化为更好的生活条件，通常被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奉为“圣杯”，过去十年间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强劲。但许多国家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指标依旧居高不下。增长质量与增长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比增长水平更重要。单靠高增长不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

包容性增长——惠及所有社会成员——是所谓优质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包容性增长的共性是增长质量，不同的人对增长质量有不同的理解。跟审美类似，对待高质量增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近几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表明，高增长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同样地，如果没有稳固的经济增长，良好的社会效果是不会持久的（Berg、Ostry 和 Zettelmeyer，2012 年）。

发展中经济体的优质增长必须有助于实现任何发展政策的最终目标——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众多文献表明，实现社会友好型持久高增长的国家更有可能快速提高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参见，例如 Dollar 和 Kraay，2002 年；Sala-i-Martin，2006 年）。因此，优质增长应该涵盖处于增长过程边缘的各阶层人群。相比增长成果的再分配，确保增长覆盖范围广泛和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更为重要。

### 质量的衡量标准

尽管经济学界一致认为单靠增长不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Ianchovichina 和 Gable，2012 年），但高质量增长仍缺乏严格定义或正式量化。

在最近一篇论文中（Mlachila、Tapsoba 和 Tapsoba，2014 年），我们制定了增长质量指数（QGI），该指数反映了增长的内在特征及其社会维度。



我们的前提是，不是所有增长都会带来有利的社会效果。增长的产生方式对其可持续性和创造体面工作、提高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的能力至关重要。在设计 QGI 的过程中，我们旨在通过专注于其内在特征和理想的社会效果来反映增长的多维性。

QGI 是一个综合指标，设计简单、透明。指标结果来自于对两大基本内容的汇总：增长的内在特征（增长强度、稳定性、多样性及出口导向程度）和社会维度（反映增长带来的理想社会效果）（见图 1）。

## 增长质量与增长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比增长水平更重要。

强劲、稳定、多样化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对于遏制贫困而言必不可少 (Dollar 和 Kraay, 2002 年)。不稳定增长会加剧贫困和破坏平等，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贫困人口的技能退化，当经济走出危机时，退化的技能得不到补救 (Ames 等人, 2001 年)。多样化增长可减少经济表现的波动性 (Papageorgiou 和 Spatafora, 2012 年)，从而有助于减贫。出口导向型增长更有可能通过边做边学、引入先进技术、知识转移、全球市场约束、竞争和外国直接投资等途径提高生产率增长幅度 (Diao、Rattsø 和 Stokke, 2006 年)。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也可能使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但 QGI 将增长波动性考虑在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一担忧。

此外，健康长寿和良好的受教育机会是被广泛认可的重要减贫指标 (Sen, 2003 年)。由于数据有限，QGI 省略了包容性的其他关键变量，如就业、不平等和环境

因素。该指数的范围介于 0—1 之间（1 代表优质增长的最高分数），覆盖了 9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在 1990—2011 年间的增长状况。

QGI 有什么新特点吗？它是联合国制定的著名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 的变形 (UNDP, 1990 年) 还是其他福利性指标？都不是：该指数与其他指数具有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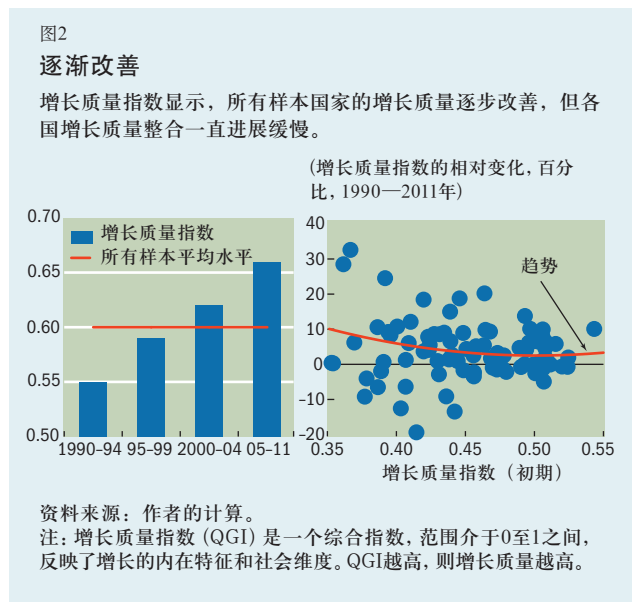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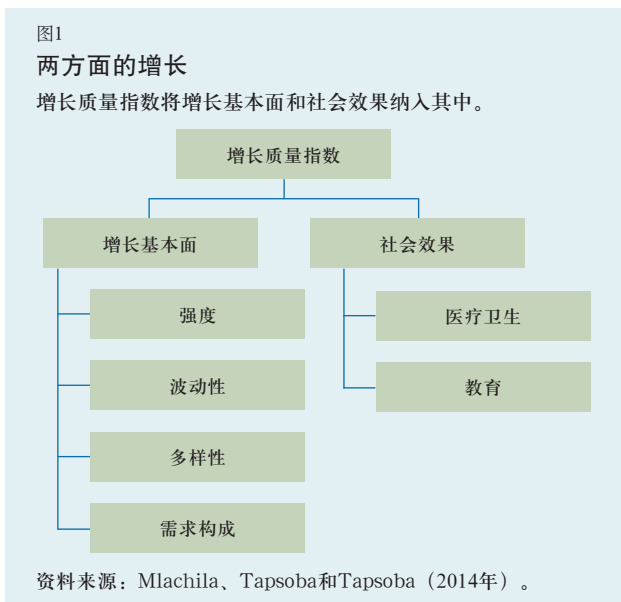
QGI 超越了收入水平，专注于增长的内在特征。HDI 主要根据收入水平而制定，其建立在给定年份中人均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可以说，HDI 实际上反映了千年累计增长情况——某给定日期的收入水平是各增长时期的收入水平总和。QGI 的优势在于其能够评估特定时期内一国和多国的增长质量。这一特点使政策制定者能够了解其增长战略是否带来了良好效果。QGI 还能够确定当前或近期政策带来的增长和社会效果。

QGI 也区别于近几年制定的社会进步指数 (SPI, Stern 等人, 2014 年)。相比 HDI, SPI 更侧重接近 QGI 的社会维度的内容，但没有将增长基本面纳入其中，而增长基本面正是 QGI 的核心内容。

## QGI 调查结果

我们从 QGI 实证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主题。

过去 20 年间，增长质量不断提升 (见图 2)，这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全球外部冲击缓解 (如贸易条件发生变动)、实施大体利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逐步向“社会友好型”公共支出的转变。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增长幅度、减少增长波动性、改善增长结构和提高其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的潜力。此外，各国增长质量整合相对缓慢。表现最差的国家往往会逐渐赶上表现最佳的



国家，只是进程相当缓慢。这一点符合增长文献中描述的传统整合假设。换言之，一旦一国的增长质量达到很高水平，持续提高增长质量将变得日益困难——就像提高预期寿命也有生物极限一样。与之相反，QGI 较低的国家往往会以相对更快的速度提高增长质量。持久的社会效益提升需要长期持续的高质量增长——30 至 40 年。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已在这一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社会保障网络尚未完全建立。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许多非洲国家也在增长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改善，但它们必须长期保持这一势头。

各国和各地区的收入水平差异显著（见图 3）。上中

等收入国家得分最高，其次是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这一点不足为奇。同样，脆弱国家在增长质量方面面临结构性障碍，通常处于落后地位。

## QGI 可能有助于引导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顺利实现增长。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拉丁美洲、中欧和东欧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 QGI 方面表现最佳，这主要得益于其在该指数的社会构成上取得了显著改善。拉丁美洲起点薄弱，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面临高贫困率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中欧和东欧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后，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从而推高了其 QGI 表现。强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通过技术和创新转移大幅提高了生产率，这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 QGI 方面表现突出的主要驱动因素。中东和北非地区紧随其后，这两个地区主要得益于在社会维度上得到改善和相对强劲的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虽然增长强劲，但由于尚未将其转化为更好的社会效果，排名最后。

实证模型表明，政策制定者在提高增长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空间（见图 4），可通过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和政治稳定性、制度质量和亲贫式公共支出以及发展金融来实现。此外，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会大有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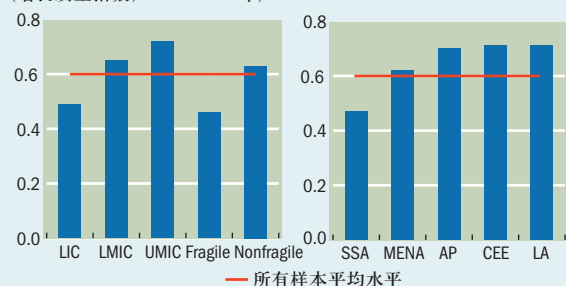
增加分配给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部门的公共资源有助于增强人力资本，这不仅将提高整体经济效益，还能够使每个人获得享受高增长成果的平等机会。大力发展金融行业有助于放宽贷款条件，释放私营部门的潜力，以创造财富和优质工作。外部条件，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将填补国内储蓄短缺，以便进行国内投资，并将加速技术和知识转移。

图3

### 弱势群体

增长质量指数显示，低收入国家、脆弱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生长质量低于平均水平。

（增长质量指数，1990—2011年）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增长质量指数（QGI）是一个综合指数，范围介于0至1之间，反映了增长的内在特征和社会维度。QGI越高，则增长质量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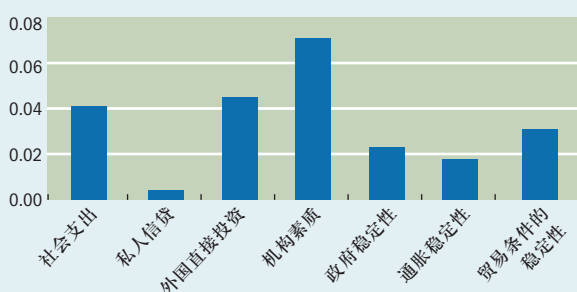
AP=亚洲和太平洋地区；CEE=中欧和东欧；Fragile=脆弱国家；LA=拉丁美洲；LIC=低收入国家；LMIC=下中等收入国家；MENA=中东和北非；Nonfragile=非脆弱国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UMIC=上中等收入国家。

图4

### 掌握控制权

增长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机构素质、社会支出和外国直接投资。

（变量变化对增长质量指数的影响，1990—2011年）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增长质量指数（QGI）是一个综合指数，范围介于0至1之间，反映了增长的内在特征和社会维度。QGI越高，增长质量越高。对社会支出、私人信贷和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提高5个百分点。对于机构素质、政府稳定性、通胀稳定性和贸易条件的稳定性：改进1个标准偏差。

## 改进空间

虽然 QGI 有利于目前对不平衡增长进行分析，但还可使用几种方法来改进这一指数。QGI 有潜力成为政策制定者监督包容性增长进度的一个及时、经济高效的工具。但与所有指数一样，只有良好的基础数据才能使其完善。社会数据的质量极差并且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多次修改，并使用 5 年平均值来进行计算。如若将不平等的衡量标准和劳动力市场变量纳入其中，QGI 指数可能会有所改进。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提醒一句：QGI 不能反映长期可持续性。简言之，该指数不能预测一国的当前政策——可能会提高当前的增长质量——是否会在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或环境灾难。例如，一国通过迅速耗尽自然资源或增加公共债务，可能会提高其增长质量。

QGI 在探究更好地衡量增长质量方面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可能有助于引导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顺利实现增长。■

蒙特福特·穆拉驰拉 (Montfort Mlachila) 任IMF非洲部的顾问，雷纳·塔普索巴 (René Tapsoba) 和桑帕闻德·塔普索巴 (Sampawende Tapsoba) 是IMF财政事务部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Ames, Brian, Ward Brown, Shanta Devarajan, and Alejandro Izquierdo, 2001,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Poverty Reduction"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Berg, Andrew, Jonathan D. Ostry, and Jeromin Zettelmeyer, 2012, "What Makes Growth Sustain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8, No. 2, pp. 149–66.

Diao, Xinshen, Jørn Rattsø, and Hildegunn E. Stokke, 2006, "Learning by Exporting and Structural Change: A Ramsey Growth Model of Thailand,"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28, No. 3, pp. 293–306.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7, No. 3, pp. 195–225.

Ianchovichina, Elena, and Susanna Lundstrom Gable, 2012, "What Is

*Inclusive Growth?" Chapter 8 in Commodity Price Volatil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 ed. by Rabah Arezki, Catherine A. Pattillo, Marc Quintyn, and Min Zhu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lachila, Montfort, René Tapsoba, and Sampawende Tapsoba, 2014, "A Quality of Growth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 Proposal," IMF Working Paper 14/17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apageorgiou, Chris, and Nikola Spatafora, 2012,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LICs: Stylized Fact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2/1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ala-i-Martin, Xavier, 2006,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 . . Convergence, Perio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1, No. 2, pp. 351–97.

Sen, Amartya, 2003, "Concepts of Poverty," Chapter 2 i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Stern, Scott, Amy Wares, and Sarah Orzell, with Patrick O'Sullivan, 2014, "Social Progress Index 2014 Methodological Report" (London: 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199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Jan Svejnar, Andrés Velasco, and many others.

A 12-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The 2016–2017 program begins in late May of 2016.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5, 2016.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sipa.columbia.edu/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http://www.sipa.columbia.edu)